

把握机遇 突出重点

努力推动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柳思维 陈薇 张俊英¹

【摘要】：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并非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国际贸易环境动荡的权宜之计，而是综合考虑中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后所确定的中长期战略方针，是对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的新发展、新运用。这一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可重点从三方面着手：一是突出扩大内需战略基点，强化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市场动力；二是突出强化有效供给创新，夯实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物质基础；三是突出完善现代流通体系，畅通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关键环节。

【关键词】：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 内需战略 有效供给 现代流通体系

【中图分类号】.F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675(2020)06-026-09

一、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马克思市场理论的新发展

2020年5月1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首次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并从供需两端强调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点任务，即一方面“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另一方面“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5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时进一步明确指出，要将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7月21日和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又分别在企业家座谈会和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强调，要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可以看到，自2020年全国“两会”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次强调“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发展格局的提出并非简单地针对当前产业链供应链因疫情而中断、个别国家企图与我国脱钩甚至施以围堵而采取的权宜之计，而是综合考虑中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后所作出的中长期战略方针。

这一发展格局的提出既完全符合马克思的世界市场理论，也是马克思市场理论的新发展、新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市场理论着重强调了大工业生产力发展、生产方式变革促使国内市场向外扩张、走向世界市场的必然性，揭示了通过世界市场循环反过来又促进国民经济其他产业发展的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1]“世界市场”的出现是生产力发展和技术革命的结果（罗志佳，2015）^[2]。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革加速了分工体系的演进，使得分工水平不断扩大和深化，从而推动各个国家参与国际分工，走向国际市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演变过程也印证了这一论述。正是在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开拓两个市场的开放过程中，中国经济开始崛起。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在扩大出口、引进外资的出口战略导向下，中国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一出口贸易大国，出口也曾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能。但国际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以及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必须更加注重国内市场及国内经济的良性循环，真正形成内需主导的大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机制。当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突出强调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正是对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的新发展、新运用。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奖励项目：“缩小城乡消费差距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探讨”（编号：19JL02）。

作者简介：柳思维，湖南工商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资深教授，中南大学商学院博士生导师，湖南长沙，410205；

陈薇，湖南工商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硕士研究生，湖南长沙，410205；

张俊英，湖南工商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副教授、博士，湖南长沙，410205。

从当前中国的发展情况来看,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还存在诸多制约因素。除面临优质的中高端有效供给不足、民营投资社会投资增速慢、实体经济部门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国内国际市场接轨程度不高等固有障碍外(张杰、金岳,2020)^[3],中国经贸发展还受到全球新冠疫情蔓延和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的叠加影响,陷入对等反制困境、疫情冲击困境、信任缺失困境和政治摩擦困境(沈国兵,2020)^[4]。疫情下国内经济循环成为主流也多属“被动”性质,还需向“主动型”的国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发展格局转变。下一阶段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要思考如何抓住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发展机遇,聚焦各个堵点,突出重点领域的改革。基于此,本文将立足于当前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宏观环境,着重关注双循环的市场动力、物质基础和关键环节,从需求、供给和流通三个层面提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

二、突出扩大内需战略基点,强化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市场动力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必须突出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强化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内生市场动力。一方面,中国已经具备强大的内需动力基础。从消费需求来看,中国已基本形成大国经济增长的以消费需求为主导的内需动力主导机制,消费连续6年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从投资需求来看,投资规模逐渐扩大的同时投资结构逐渐转向高附加值的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以5G、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下简称新基建)成为新的投资重点,将产生巨大的乘数效应、驱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人口红利减弱、国际贸易不确定性增加等因素严重制约了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导致外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非常有限,倒逼中国更着眼于内需的刺激推动国内经济良性循环。

(一) 中国已基本形成大国经济增长的以消费需求为主导的内需动力主导机制

根据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理论,大国经济在进入第五发展阶段后,驱动其经济增长的主导需求将转向国内消费需求,投资和出口需求仅作为辅助(杜焱、柳思维,2012)^[5]现阶段,无论是从经济总量还是市场潜力看,中国都已经具备经济大国应有的规模和结构特征。经济总量上,2019年中国GDP总量达99.0865万亿,稳居世界第二位,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市场潜力上,中国人口众多、国土资源广阔、国内市场统一程度高,且拥有庞大的国内生产消费能力,具有“超大规模性”的市场优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等,2020)^[6]。同时,中国也已基本形成了大国经济增长的以消费需求为主导的内需动力主导机制,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消费需求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从绝对量来看,2019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41.2万亿元,同比增长8.0%,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6.0%^[7]。人均消费方面,2019年人均消费支出为21559元,首次超过2万元,扣除价格因素影响后实际增长5.5%。从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来看,新常态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就逐渐由投资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转变,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57.8%,高于资本形成总额26.6个百分点,连续6年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引擎”。

2. 消费结构升级引领产业结构升级。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市场商品供给的日益丰富,我国居民消费正逐渐从注重量的满足转向追求质的提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趋势明显。一方面,以恩格尔系数下降为表征的“必需品”消费占比逐年下降。1978年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为57.5%和67.7%,经过40余年的发展,2019年恩格尔系数下降至28.2%,其中城镇为27.6%,农村为30%,整体已达到富裕水平^①。另一方面,以文教娱乐、医疗保健、交通通信等为代表的服务性消费占比不断上升。服务消费比重由“十二五”末(2015年)的41.1%升至2019年的45.9%。而消费结构升级又加速了产业结构调整,引领产业结构升级。为顺应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变化,产业发展逐渐向中高端转化,特别是以现代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占比大幅上升。2015年第三产业占比首次突破50%,2019年达到53.9%,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9.4%,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3. 新业态发展创造一大批新就业岗位。在人工智能、大数据、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支撑下,在线教育、远程办公、电子商务等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取得蓬勃发展,催生了大量新的产业形态,使产业内部分工更加深化与细化,并依靠互联网平台创造出的新需求衍生出数以万计的就业岗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第一季度我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逆势同比增长 13.2%，在疫情防控以来的几个月里，仅支付宝就新增了 25 万小程序，带动增加了 75 万个小程序的开发和运营岗位^[8]。2020 年 7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3 部门公布的《关于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激活消费市场带动扩大就业的意见》更是对包括在线教育、互联网医疗、新个体在内的 15 个新业态新模式发展作出了全面部署，新业态发展所带来的强大就业吸纳能力将成为未来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动力。

（二）顺应国内投资需求变化新机遇，进一步拓展投资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投资规模和结构均发生了明显变化。从规模上来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由 1981 年的 961 亿元增加至 2019 年的 560874.3 亿元，增长了 582 倍。从结构上看，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我国投资结构逐渐转向高附加值的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2020 年 1-8 月，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投资高于总投资增速 11 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 8.2%；高技术服务业中的电子商务服务业、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 29.7%、18.2%^[9]。同时，以 5G、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新基建成为新的投资重点。截至 2020 年 3 月 10 日，已有 25 个省市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及新基建，其中 8 个地区明确规划了年内计划新建 5G 基站的数量，合计约 27.6 万个^[10]。

新基建作为数字经济的关键技术支撑，不仅本身能够带来很大的投资需求，而且还能够通过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产生巨大的叠加效应、乘数效应。据中国信通院测算，到 2025 年 5G 网络建设投资累计将达到 1.2 万亿元，5G 网络建设还将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以及各行业应用投资，预计到 2025 年将累计带动超过 3.5 万亿元投资^[11]。然而，从新基建目前的体量来看，还不足以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有力增长点，由此带来的“新数字鸿沟”也必须重视。同时，我国民间投资活跃度不高，一些投资领域如金融业仍存在投资效率低的问题，导致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相对有限。

为此，可考虑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进一步拓展投资需求，强化畅通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投资动力。一方面，既要抓紧补齐传统基建短板，也要合理扩大新基建规模。传统交通、水利、能源等基础设施要升级提质、要补短板，还有新的投资空间。更重要的是，要加快新基建建设，在充分考虑不同区域资源需求和供给差异的基础上，继续加大新基建的投资力度，完善新基建配套服务保障体系，最大限度发挥其乘数带动作用。另一方面，在拓展投资需求的过程中，既要发挥国有企业的投资主体作用，也要注重发挥民营企业的作用。盘活国有资本，为民营经济腾出更多工业、商业、产业类市场空间，打通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资金循环，提升民间资本投资积极性（黄奇帆，2020）^[12]。

（三）国际经贸形势变化倒逼中国更注重内需推动国内经济良性循环

现阶段，中国外向型经济仍受到人口红利减弱、国际贸易不确定性增加等因素的制约，导致外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非常有限，外需市场面临严峻困境，倒逼中国更着眼于内需的刺激推动国内经济良性循环。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有 7 个年份为负，2019 年外需占 GDP 比重、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仅为 1.5% 和 11%。

1. 外向型经济所依靠的人口红利逐渐减弱。早在 2012 年中国就越过了“人口红利拐点”，之后人口出生率逐渐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下跌的同时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有效劳动供给约束不断凸显。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19 年人口出生率为 10.48%，继 2018 年创出历史新低后再度“触底”，劳动年龄人口为 89640 万人，比 2018 年减少 89 万人，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达 64.0%。相应地，劳动力用工成本快速增加，大幅度地削弱了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低价竞争优势，导致外向型经济发展动力不强。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东莞，在外向型经济的拉动下还赢得了“世界工厂”的称号。然而，人口红利的消失带来了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再加上近几年来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加征关税，倒逼沿海地区将低价值环节、劳动密集型产业转至西部地区或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东南亚国家。当然，这类产业的转移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加速国内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但由此对外向型经济造成的冲击也是不可避免的。

2. 国际环境新变化使中国外向型经济增长遭受诸多挑战。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对全球贸易、投资、承包

合作及劳务合作等造成了巨大冲击，全球经济面临衰退风险，中国经贸发展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波及。据 Worldometers 世界实时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 10 月 21 日 8 时 44 分，全球累计确诊逾 4102 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 112.8 万例。其中，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 851 万，死亡病例超 22.6 万例。另外，根据世界银行 2020 年 6 月 8 日的最新估计，全球经济预计将萎缩 5.2%，6 月 24 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则显示，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将萎缩 4.9%。对于中国而言，虽然经济体量优势使得中国在应对外部冲击时拥有较强的韧性和较大的回旋空间，但中国经济运行方式仍存在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在短期内参与国际经济循环仍受到明显抑制。根据展金泳等（2020）^[143]的测算，2020 年我国第一季度的实际贸易额为 9430.06 亿美元，潜在贸易总额为 11123.92 亿美元，因新冠疫情带来的贸易损失为 1693.86 亿美元，降幅达 15.23%，对国际贸易的打击也远超 2003 年的 SARS。另一方面，由中美摩擦升级演变导致的国际贸易不确定性增加。从 2018 年至今中美之间已经经历三轮五次的贸易战，在这一过程中美国逐步从经贸摩擦到对中国施以全面打压，由“特殊 301 调查”“232 调查”及出口管制等进一步升级演变为科技封锁，采用政治手段限制中国实力强的跨国企业进入海外市场，如打压中兴和华为、封禁中国的抖音和微信在美业务或强令出售等（余淼杰，2020）^[144]，使得中国难以通过继续扩大出口的方式来拉动经济增长。

三、突出强化有效供给创新，夯实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物质基础

（一）高质量有效供给是畅通双循环的重要基础

要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不仅要有强大的需求端，也必须有强大的供给端，能够及时有效地向市场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然而，现阶段我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仍然集中在供给端，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国内供给端的转换仍滞后于消费需求升级，优质的中高端有效供给不足。近年来，随着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和消费观念的改变，消费结构升级趋势明显，居民消费需求逐渐由实物型消费向服务型消费转变，由低质量低品质消费向高质量高品质消费转变，特别是由数字技术驱动的新消费成为消费主流（毛中根等，2020）^[145]。然而，中国在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等领域仍明显落后于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并且差距越来越大，导致满足消费升级的高品质商品和服务相对短缺，国内消费者跨国抢购国际优质消费品的现象频发，大量国内有效需求流入国际市场，供需不匹配矛盾凸显。

2. 产业链供应链循环受阻，供给体系质量有待提高。受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循环受阻甚至面临断裂风险。“封城”、居家隔离等抗疫要求使得劳动力供给出现“断崖式”下降，从而迅速引起企业资金流、物流减少或中断，最终导致产业链和供应链协调不畅甚至中断。对于中国而言，以服装、半导体与集成电路、光学与精密仪器、化学品、家电等为代表的出口订单明显减少，同时机电、化工、运输设备、橡胶塑料等外向依赖度较高的进口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企业停工停产、产业链和供应链大范围中断（黄群慧，2020）^[146]。其中，“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企业遭受打击最为严重。2020 年 2 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仅为 35.7，成为测算该数据以来的最低点。尽管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不会因为短期外部冲击而改变，但由此暴露出的产业链、供应链缺乏韧性的问题应格外重视。从国内来看，现有产业集群地域优势发挥不足，导致在复工复产的过程中上下游产业链不协调、不同步，且制造业核心领域创新明显不足，关键核心技术仍受制于国外，产业链供应链尚未形成闭环运营。从国际来看，产业链供应链同国际产业现存的链条接轨不足、匹配不够、融通协同还有待改进^[147]。

（二）现阶段国内已形成了强大的供给能力

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 70 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 40 余年的发展，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全国已经具备强大的供给能力。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工业基础非常薄弱，1978 年工业增加值仅为 1622 亿元，产品种类也比较单一，经过改革开放 40 余年的发展，工业经济取得突出成就。

1. 工业门类齐全，供给基础强大。中国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至今已拥有 41 个工业大类、207 个工业中类、666 个工业小类，在世界 500 多种主要工业产品当中，有 220 多种的产量全球第一都是中国，制造业占

全球比重也由 1990 年的 2.7% 提升至 2019 年的 28.1%，自 2010 年起连续 10 年稳居首位。

2. 工业产值持续增加，工业产能利用率不断上升。据国家统计局 2019 年统计公报显示，2019 年我国工业增加值达到 31.71 万亿元，在 40 余年里增长了 194 倍，同时工业产能利用率不断提升，达到 76.6%。

3. 工业企业数量稳步增加，工业企业实力不断攀升。与产值扩大相对应，工业市场主体大量涌现，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数量由 1978 年的 348400 个增至 2019 年的 377815 个。同时工业企业实力明显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由 1979 年的 3999.36 亿元增至 2019 年的 1057825 亿元。从全球制造商集团编制的 2017 年《全球制造 500 强》排行榜来看，中国共有 72 家企业上榜，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位居世界第三。

4. 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迅速发展，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变。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的推动下，我国工业经济逐渐由数量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提升转变，以高端装备制造业、新能源产业为代表的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取得迅速发展。2016 年至 2019 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为 10.5%，快于同期规模以上工业 4.4 个百分点。2019 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更是高达 11.5%，成为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18]。另外，随着 5G、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和应用，中国制造开始升级并逐渐转向“中国智造”。

湖南作为制造强省，同样具备强大的供给能力。改革开放 40 余年以来，湖南工业经济实现规模总量大幅跨越、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发展质效显著提升。首先，总量规模不断扩大。全省工业增加值由 1978 年的 51.94 亿元增至 2019 年的 13818.06 亿元^②。其中，装备制造业占工业总产值比重显著提升，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主动力量。2019 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4.1%，对全省规模工业的增长贡献率达 50.9%。其次，工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一方面，原材料等传统特色产业实现转型升级，新材料工业成为重点发展领域。另一方面，以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为代表的新兴优势产业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湖南制造走向世界的名片^[19]。2019 年，湖南省规模工业高加工度工业增加值增长 13.1%，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6.3%。最后，工业发展质效大幅提高。尤其是 2017 年提出“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以来，湖南大力开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工业经济质量效益显著提升。

（三）以科技创新引领供给侧改革、增加高质量有效供给

当前我国供给侧面临的问题，归根结底在于科技创新不足。2020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对湖南提出打造“三个高地”的战略定位，其中之一就是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因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以科技创新作为引领和支撑，通过科技创新驱动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增强高端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力。具体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1. 提升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根据《2020·径山报告》，“十四五”时期我国低劳动成本优势和“后发优势”将趋于消失，这意味着以往外向依赖式的学习和模仿创新将越来越困难，必须通过自主研发实现创新驱动式发展。近些年来的中兴、华为被美制裁事件也足以表明企业自主创新的重要性。而要加强自主创新，首先，就要实现核心技术人才可控，通过加快教育和科研体制改革，鼓励产教融合、产学研结合，培养一批高端人才。同时推行更为积极有效的人才激励政策，包括股权激励、收益奖励、社保等，将关键核心技术人才留住、用好。其次，加强关键核心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及相关立法，保护企业的创新力和竞争力。最后，深化科技投融资、评价、管理、奖励等体制改革，破除一切制约自主创新的制度障碍。

2. 加快科技成果应用转化。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仍面临科技成果转化率低、可应用科技成果率不高等瓶颈。对此，可重点考虑从用好“数字技术”和“平台载体”两方面着手。一方面，用好科技成果转化的“科技”本身，在 5G、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应用层面进行突破，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率。当前，我国已在 5G 承载标准制定、5G 产业链方面走在世界前列，下一步必须要抢抓先机，加快其在各个领域的推广应用，以获取先发优势。另一方面，用好科技成果转化所依靠的平台载体，加快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既包括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自由贸易试验区、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等各类试验示范区，也包括行业龙头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等。

3. 强化区域协同创新机制。现阶段,我国区域间科技发展不平衡问题仍较为突出。从省会/副省级城市来看,2019年城市科技创新发展指数排名前10的分别为北京、深圳、上海、广州、南京、杭州、武汉、西安、长沙、成都,排名靠前的大多是沿海发达城市;从城市群来看,2019年长三角城市群科技创新发展指数达0.648,明显强于其他城市群,天山北坡城市群最低(0.106),两者相差达0.542之多^[20]。此外,部分地区仍存在科研设施、创新园区重复建设、新兴产业同质化以及招商引资恶性竞争等问题,导致创新投入难以转化为区域增长动力,区域间分化程度加剧(赵志耘,2016)^[21]。对此,必须进一步强化区域协同创新机制。一方面,建立强有力的协同创新组织平台,加强区域间创新资源的共建共享,实现优势互补、分工协作。另一方面,总结科技创新能力强的城市的重要发展举措,在保留落后区域自身特色的基础上开展创新改革试验,形成一批可复制推广的经验。

四、突出完善现代流通体系,畅通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关键环节

(一) 流通是畅通社会生产循环的关键环节

在生产、消费、流通(交换)、分配四个环节中,流通是决定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能否实现的关键环节。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流通作为连接生产和消费的中间环节,既能反向作用于生产,推动生产方式的变革,又能作用于消费,促进消费扩容提质,从而促进生产和消费有效对接,实现从产品到商品的“惊险跳跃”。流通的这一“纽带”作用在信息技术纵深发展后的数字经济时代更为明显。在数字经济时代,“流通”也不再只是狭义上的商品流通,而是包括商品、资本、技术、信息等各类要素和服务在内的流通。一方面,数字经济时代的现代流通能够基于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海量分析消费者的消费行为,高效、精准地捕捉消费需求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定制化生产,引导生产方式变革。如电商这一现代流通业态在农村地区的渗透就有效改变了传统农业生产“小而散”的问题,引导农业实现集约化和标准化生产。另一方面,现代流通有助于打破地域空间的限制,减少商品交易的中间环节,节约交易成本,为消费者提供更加快捷、实惠、丰富的消费选择,刺激消费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商贸流通业完成了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流通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流通体系建设取得明显进展。具体地,流通市场规模持续扩大,流通网络体系日益完善,同时以电子商务、智慧零售为代表的流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成为新常态下刺激消费增长的重要力量。2019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40.8万亿元,比1978年增长了260倍。2019年流通行业增加值^⑥更是高达156687.27亿元,占GDP比重约为15.8%。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流通业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如疫情期间,电商帮助搭建“助农”通道,有效畅通了农产品流通网络体系、解决农产品滞销问题。2020年1-8月,我国农村地区收投快件超过200亿件,占全行业总量已超过40%,快递处理量增速比城市高10个百分点以上。

虽然我国商贸流通体系建设已较为完备,但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要求相比,仍存在一定的短板(依绍华,2020)^[22],如物流成本过高、区域间流通壁垒凸显、流通基础设施供给不足、供需对接不顺畅等,严重阻碍国民经济循环的畅通。要畅通双循环,就必须牢牢把握流通这一关键环节,发挥其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二) 完善现代流通体系是畅通双循环的重要手段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9月9日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中强调的“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把建设现代流通体系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来抓”,新发展格局的构建要抓住流通这一关键环节,突出完善现代流通体系,具体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1. 构建现代大交通网络与物流网络,打通流通的痛点堵点。在现代社会大流通中,商流、信息流、资本流 and 知识流等要素流通都能够通过互联网实现替代,从而达到低成本、无障碍的效果,只有“物”流即物理意义上的流动不可替代,物流成本也就成为了流通总成本的主体部分(陈文玲,2020)^[23]。这就意味着要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就必须降低物流成本,必须要有顺畅的现代物流体系作为支撑。而现代物流体系建设的關鍵就在于现代“大交通”网络和物流网络的构建。一方面,加快建设现代化

“大交通”网络。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数字技术，推进互联网与交通运输行业融合创新，打造智慧交通体系。重点利用数字技术对航空、铁路、公路进行实时监测和风险预警，提供热点商圈路况、堵点异常监测等服务。同时加快推动现代化“大交通”网络构建所需的交通设施对接工作，发展城市共同配送、城乡一体化配送等集约高效运输组织模式，加强大交通体系骨架网络中国家公路与重要机场、港口、铁路枢纽的有效衔接。另一方面，加快完善现代物流网络体系。加大新基建领域布局和投资力度，大力发展智慧物流、配套物流、应急物流、快递物流，打通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以及城市内部商品物流的主干动脉及微循环通道（柳思维，2020）^[24]。

2. 完善全国统一市场体系，突破区域流通障碍和壁垒。现阶段，我国对内开放相对不足，主要表现为地区间行政壁垒严重，各地区呈现出严重的市场非一体化格局，妨碍资源要素配置效率的同时也导致我国潜在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难以转化为实际的竞争优势（刘志彪，2020）^[25]因而，要形成国内市场大循环，就必须实行进一步的对内开放，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突破区域流通障碍和壁垒。重点从以下三个方面着力：首先，完善构建统一大市场所需的硬件基础设施。在开展交通运输网络建设时要更多地关注区域之间运输线路的规划，而不仅仅是区域自身内部的商品通达性，加强跨省区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建设。其次，破除制约商品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障碍。打破传统的属地管辖、条块分割僵硬的计划体制，并尽可能地解除对行业、部门不必要的管制，特别是要重点拆除民营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各类进入障碍，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打造自由竞争的营商环境。最后，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优化各经济圈、经济带、经济区之间的产业分工协作，提高区域间产业联系水平、效益效率和分工水平，同时推进区域间流通资源共享、信息平台共建，最大程度发挥协同效应，以区域经济一体化推动市场一体化。

3. 利用数字技术改造升级流通体系，提高流通服务功能。随着互联网技术的纵深发展，居民消费需求逐渐呈现出碎片化、多元化、个性化、品质化等特征。而传统流通体系多以现金、现货、现场“三现”交易方式为主，并由传统百货、传统专业市场、传统物流等业态构成，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些业态对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电商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还稍显不足，导致功能发挥不足、效率低下，已经无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亟需通过数字技术加以改造升级，以提高流通服务功能。尤其是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中美贸易摩擦等外部因素影响下，利用数字技术改造升级传统流通体系，对于完善现代流通体系、增强经济韧性尤为重要。其作用原理在于，通过各类大型数字化平台，以一种“流通革命”的方式，将流通深度融入到生产、消费、贸易、市场、科技的内部各领域、各环节，为它们提供导向和赋能，从而改变它们的运行流程、动力来源等（王先庆，2020）^[26]。针对如何利用数字技术改造升级流通体系，可考虑以下几点：

一是数字赋能流通主体现代化。支持传统批发零售、物流、餐饮、供应链服务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引导其将业务系统向云端拓展，通过互联网开展销售、服务、管理，实现经营模式和管理模式的网络化、协同化和智能化，培养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流通企业。二是数字赋能流通载体现代化。依托5G、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等现代数字技术，改造升级传统流通设施，发展智慧交通、智慧物流，提高流通设施的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三是数字赋能流通治理现代化。加快数字技术在流通治理中的应用，如通过数字技术给市场主体进行精准画像，建立高效便捷的流通领域信用体系等。

注释：

①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估计，个人或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在19%及以下为最富裕，20-29%之间为富裕水平，30-39%之间为相对富裕水平，40-49%之间为小康水平，50-59%之间为温饱水平，60%以上为贫困水平。

②数据来源：湖南省统计局。

③将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和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三大行业增加值加总得到。

参考文献：

-
-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2.
- [2]罗志佳.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及其现实启示[J].学术探索,2015(1):18-22.
- [3]张杰,金岳.我国扩大内需的政策演进、战略价值与改革突破口[J].改革,2020(9):15-26.
- [4]沈国兵.疫情全球蔓延下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促进经贸发展的困境及纾解举措[EB/OL].(2020-09-11)[2020-11-18].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50.1023.C.20200911.1640.003.html>.
- [5]杜焱,柳思维.国家规模、经济增长阶段与需求动力机制结构演变[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2(6):5-12.
- [6]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马建堂,张军扩.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性”优势推动我国经济实现从“超大”到“超强”的转变[J].管理世界,2020(1):1-7+44+229.
- [7]言之有范.文化消费新格局来了!促进文化消费的新思路是什么?[EB/OL](2020-11-04)[2020-11-18].<https://view.inews.qq.com/a/20201104A05YFT00>.
- [8]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164万人通过支付宝灵活就业小程序开发者达75万[EB/OL].(2020-03-20)[2020-11-18].<https://tech.huanqiu.com/article/3xUvD0e8vE6>.
- [9]丁茂战.正确认识我国经济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EB/OL].(2020-10-14)[2020-11-18].<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20/1014/c40531-31891408.html>.
- [10]新京报.发改委4提新基建机构:5G、轨道交通总投资约超7000亿[EB/OL].(2020-03-24)[2020-11-18].<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gncj/2020-03-24/doc-iimxxsth1319128.shtml>.
- [11]中国新闻网.中国信通院:预计到2025年5G网络投资累计达1.2万亿元[EB/OL].(2020-03-04)[2020-11-18].<http://www.chinanews.com/cj/2020/03-04/9113848.shtml>.
- [12]黄奇帆.如何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构建双循环新格局[J].瞭望,2020(29):22-26.
- [13]展金泳,张航,林桂军.新冠疫情对我国对外经贸发展的冲击及应对[J].国际贸易,2020(7):16-24+40.
- [14]余淼杰.“大变局”与中国经济“双循环”发展新格局[EB/OL].(2020-09-27)[2020-11-18].<http://kns.cnki.net/kcms/detail/31.2089.F.20200925.1344.002.html>.
- [15]毛中根,谢迟,叶胥.新时代中国新消费:理论内涵、发展特点与政策取向[J].经济学家,2020(9):64-74.
- [16]黄群慧.新冠肺炎疫情对供给侧的影响与应对:短期和长期视角[J].经济纵横,2020(5):46-57+2.
- [17]新浪财经.疫情暴露中国供应链三大软肋[EB/OL].(2020-04-17)[2020-11-18].<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4226985978154298&wfr=spider&for=pc>.

-
- [18]经济参考报. 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路线图”浮现[EB/OL]. (2020-09-24) [2020-11-18]. http://www.xinhuanet.com/2020-09/24/c_1126532988.htm.
- [19]湖南省人民政府. 改革开放40年湖南:工业经济跨步朝前发展动能澎湃向上[EB/OL]. (2018-10-31) [2020-11-18]. http://www.hunan.gov.cn/hnszf/hnyw/sy/hnyw1/201810/120181031_5151749.html.
- [20]中国金融信息网. 中国城市科技创新发展指数2019发布北京强势领跑[EB/OL]. (2020-01-07) [2020-11-18]. <http://news.xinhua08.com/a/20200107/1906461.shtml>.
- [21]赵志耘. 以科技创新引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J]. 中国软科学, 2016(9): 1-6.
- [22]依绍华. “双循环”背景下构建商贸流通体系新格局[J]. 中国发展观察, 2020(18): 20-23.
- [23]陈文玲. 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与双循环新格局的构建[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4): 1-8+105.
- [24]柳思维. 关于促进形成强大国内统一市场体系的思考[J].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1): 34-39.
- [25]刘志彪. 重塑中国经济内外循环的新逻辑[J]. 探索与争鸣, 2020(7): 42-49+157-158.
- [26]王先庆. 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和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的内在逻辑[N]. 南方日报, 2020-10-12.